

评凯洛夫《教育学》论文选辑

教学参考资料

山西省教育学院 教育教研室 编印
资料室

目

录

试评凯洛夫《教育学》.....	苏 甫 (1)
教学原则.....	凯洛夫《教育学》摘录 (47)
如何评论凯洛夫的教育思想.....	沈适函 (64)
从凯洛夫教育思想体系中 解放出来.....	吴 杰 (97)
从赞科夫看凯洛夫.....	牛 瑾 (108)
附录：	
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	杜殿坤 (129)
赞科夫關於提高教学质量的 观点概述.....	(151)

评凯洛夫《教育学》

苏 甫

前 言

一、为什么要评价凯洛夫《教育学》？

首先，为了发展教育理论、创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学，而把凯洛夫《教育学》当作一个借鉴。

一九四八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由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凯洛夫教授主编的《教育学》，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传入我国的。在我国翻译出版以后，逐渐被当作我国师范院校的教育学教科书使用了。同时，广大教育行政工作者和学校教师也把它当作教育理论学习材料，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起来了。一九五〇年以来，先从东北地区开始，大约到一九五二年已遍及全国，在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曾一度形成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特别是辽宁省，尤其是旅大市，当时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在这个时期里，我们是把这本《教育学》完全当作社会主义教育学来学习和运用的，所以它在我国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我国普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现在，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使我国教育事业适应“四化”的需要，更好地为“四

化”服务，就必须认真总结建国三十年来我国教育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客观规律，尽快地创建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为了作为一个借鉴，我们不能不对这本曾经对我国教育事业发生过很大影响的《教育学》作出正确的评价。

其次，为了拨乱反正，澄清是非，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而给凯洛夫《教育学》以应有的历史评价。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的评价，曾经三起三落：一九五八年在“教育大革命”中第一次批判这本《教育学》，认为它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等等。一九五九年曾一度基本肯定了它，说它有缺点，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本社会主义的教育学。一九六〇年第二次批判它，要揭露它的“修正主义本质”，说它只讲人性论，不讲阶级论；只讲建设，不讲革命；等等。一九六一年以后，直到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整个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批判它，当时它是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可是，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运动中，又第三次批判它，这次是全面批判，全盘否定，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翻版，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学。但是，我们认为，这三次批判尽管是简单粗暴的，也给人们造成了思想混乱，然而，它的目的是为了闯出一条我国自己办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它的性质仍不失为学术批判。至于林彪、“四人帮”的所谓“批判”则截然不同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利用上述三次批判的极左思潮，把它推向了极端，在教育战线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大肆践踏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疯狂摧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他们以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为名，行篡改马列主义教育理论之实。他们为了全面否定凯洛夫《教育学》，肆意给它扣上“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天才教学”、“专家治校”等等不值一驳的大帽子。一九七〇年二月，他们御用的上海大批判写作组炮制的黑文《谁改造谁》，在被他们控制的《红旗》杂志上抛出来了。他们的罪恶目的是，假借批判和否定凯洛夫《教育学》，来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十七年社会主义教育，为他们炮制的《全教会记要》这个教育战线的黑法定调子、造舆论，为他们那个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制造理论根据，为“两个估计”的出笼鸣锣开道。他们的阴险手法是，首先把凯洛夫《教育学》打成“修正主义”的，然后说十七年是“全盘苏化”，学习和运用的都是凯洛夫《教育学》，说凯洛夫《教育学》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因此十七年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是“黑线专政”。可见，他们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其性质是搞政治阴谋，而不是学术批判。由于他们的倒行逆施，人们的思想就越发混乱，是非界限就更加混淆不清。今天，为了拨乱反正，澄清是非，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把被他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我们不能不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并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二、评价凯洛夫《教育学》应该坚持什么观点和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

对待凯洛夫《教育学》，应该象对待世间一切事物那样，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一分为二。对它所阐述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符合马列主义观点、反映客观教育规律的东西，又要看到它的缺陷和错误。既不应该象“四人帮”那样任意扣上几顶大帽子简单粗暴地予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全面肯定，照抄照搬。至于说这本《教育学》应该是三七开或四六开，这样笼统地说它是几开，也是不科学的。

其次，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则。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背离了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我们重新评价凯洛夫《教育学》，必须彻底摆脱“凡是”派的影响，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不唯上，不唯书，不管是谁说过的，也不管书上有没有的，凡是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我们就应该予以肯定，反之，

我们就应该予以否定。

三、评价凯洛夫《教育学》

应该着重那些方面？

首先，凯洛夫《教育学》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它对当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起过什么作用？传入我国以后产生过什么影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应该首先对它的历史作用作一个全面概括的评价。

其次，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一定社会的教育，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决定的。教育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培养一定类型的人来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而培养人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的。要办好学校教育，一方面必须按照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必须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同时还必须考虑学校工作的特点。凯洛夫《教育学》对于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关系，以及学校教育工作的特点，都作了一定的论述。那么，它对这三个方面的论述究竟怎么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该着重从这三方面来分析、评价它。

评凯洛夫《教育学》 的历史作用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分析评价凯洛夫《教育学》的历史作用时，也必须把它提到它所发生作用的那个历史范围之内。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就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看看这本书对当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起过什么作用，看看这本书传入我国以后产生过什么影响。

一、凯洛夫《教育学》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起的作用。

应该肯定，凯洛夫《教育学》，是一本力图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来分析教育问题的教科书。这本书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为苏联培养大量合格的建设人才。这正是历史向当时苏联学校教育提出的迫切任务。

回顾三、四十年代苏联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到，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多么迫切需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和技术工人队伍啊！一九二八年“沙赫特事件”的惨痛教训，二十年代在教育改革中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恶劣影响，造成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使苏联学校曾一度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技术队伍的状

况严重不相适应。斯大林曾经指出：“只要回忆一下沙赫特事件，就能了解造就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是多么迫切。”“要把事业向前推进，就必须从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加速造就新的专家干部”。为此，联共（布）中央曾提出了加速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宏伟任务。为了纠正以往学校教育工作中的错误，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在三十年代，联共（布）中央曾公布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如：《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1931年9月5日），《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决定》（1932年8月25日），《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1936年2月12日），《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1936年7月4日）。

要想理解这些决定的重大历史意义，需要回忆苏联二十年代教育改革中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情况。那时，在教学内容上，曾出现过“打倒教科书”，要“把教科书彻底从学校清除出去”的极左口号，实行所谓“综合课程”或“单元教学大纲”，按“生活单元”组织教材，并以劳动为中心，在每个“生活单元”中拼凑一些有关自然、社会、劳动等方面的零碎片段知识，用所谓“工作手册”、“插页课本”来代替教科书。“综合课程”是根据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理论编制的，它破坏了各学科的独立性和各科知识的系统性。在教育方法上，他们抄袭过美国的“道尔顿制”，即分组实验和设计教学法。这种制度取消班级授课制度，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鼓吹“学校消亡论”。此外，那时还出现过取消考试考查和家庭作业等错误做法。由于这些错误做法，所以，造成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联共（布）中央上述一系

列决定，就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作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决定里，规定废除“单元教学大纲”，采用分科编制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决定中指出：分组实验法“结果形成教学工作无人负责，降低了教师的作用”，还指出“想把所谓设计教学法作为一切学校工作基础的企图是以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为出发点的，它在实际上想使学校趋于毁灭”，为此，规定：“中小学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应当是分班上课，每班应当有严格规定的日课表和固定的学生成员。”

“教师必须负责有系统和连贯地讲述他所教的学科”要求在学校一切教学工作中，保证教师的领导作用。另外，对系统考查学生知识的方法也做了具体规定。联共（布）中央的这些决定就是对当时教育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它排除了“左”右干扰，肃清了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反映了教育、教学的一条客观规律。

凯洛夫《教育学》总结了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战线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基本上贯彻了三十年代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方面上述一系列决议的精神，是为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正确路线服务的。这本著作同资产阶级教育学相比较有了很大的进步，它确定了教育的基本范畴，赋予了共产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以新的内容，它对社会主义教育规律作了一定的揭示和论述。这表现在，它既揭示了学校教育自身的一些规律，也论述了教育和政治、经济的一些关系。因此，总的看来，尽管它还不是一本完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但是，这本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学，在当时却是一本很进步的教育学教科书，它对当时苏联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大量合格的人才，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已被大量历史事实所充分肯定。这里仅举一例就满足以说明：一九五七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先于美国第一次上天，深深刺激了美国总统和美国第一流科学家。他们反复研究的结果认为，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之所以能先于美国而第一次上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苏联中小学校办得好，中小学的基础理论教育搞得 好。他们认为，尖端科学要有好的研究成果，必须办好研究所，要办好研究所就得办好大学，要办好大学就得办好中、小学和幼儿园。为了争取到在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制定了长期改革教育的计划，彻底改革了中、小学的基础理论的教育。

当然，这里分析、评价的是凯洛夫《教育学》的历史作用，而不是评价它现在或将来的作用。总的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前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教育规律的探索也是不断深入的。关于凯洛夫《教育学》的作用问题，六十年代以来，在苏联已开始有了争论，特别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约两年间，争论极为激烈。目前，苏联的赞科夫派和凯洛夫派还在继续争论着。赞科夫也是凯洛夫《教育学》的编者之一，他是苏联心理学家、教育科学博士、苏联教育科学院正式院士，是该院普通教育研究所的“教育与发展研究室”的领导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十年间，他的实验室进行了“教学与发展的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百五十种著作。他对统治了几十年的苏联传统的教学论，包括他自己参加编写的凯洛夫《教育学》、丹尼洛夫、叶希波夫《教育学》及各种教学法，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对旧教学体系进行了全面批判。根据他的实验，苏联小学可由四年缩短为三年。他的实验是在

苏美争霸的背景下进行的，代表着苏联教育界的一种要求革新的意向。而这种革新意向是符合世界形势的发展的。因为，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而凯洛夫派的一套教学体系，也有几十年没经过重大改革，与新形势要求很不适应。新形势向教育提出的要求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迅速培养科技人才。而培养科技人才的着眼点，现在许多国家的教育界都普遍放在从小培养儿童的创造思维上。从这个角度看，赞科夫的实验是符合苏联社会要求的。尽管凯洛夫派对赞科夫派的“新体系”还不断进行着全面的反批判，看来赞科夫派的实验研究是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虽然如此，也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凯洛夫《教育学》的历史作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我们应该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凯洛夫《教育学》的历史功绩。

二、凯洛夫《教育学》传入我国后对我国教育改革所产生的影响

五十年代初期，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不久，正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时期。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极端仇视，实行全面封锁政策，而苏联是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联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和我国进行友好合作的。在这样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只能“向苏联一边倒”，“向苏联学习”，这是完全正确的。引进凯洛夫《教育学》也是完全必要的。那么，引进以后产生了什么影响

呢？历史事实证明，它对我国五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我们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学校教育，清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特别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提高教育质量，开展教育科学的研究，都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至于我们在“向苏联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比如，不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辨这本书中的正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这是另外一回事，不应该把这笔帐记在凯洛夫《教育学》上，更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

当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这本书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上，在理论阐述和思想方法上，都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教育工作产生过不良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将在后面加以具体分析。

还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教育虽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五十年代初期的教育改革起过积极促进作用；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并不就是照搬凯洛夫《教育学》来办的。例如，在国民教育制度方面，虽然我国当时的教育学教科书中，也接受了凯洛夫《教育学》所提出的国家性、统一性等五个原则，但在实践中，我们仍旧保持了民办与公办并举的原则，保持了“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的特点。至今仍然如此。这是因为，我国有马列主义教育原理与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指导，有老革命根据地、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做基础，所以我国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并不就是按照凯洛夫《教育学》来办的。应该承认，我国社会主义教育

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乃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导下，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批判地吸取我国和外国的教育历史经验，其中包括苏联的教育经验，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教育进行改造、革新、创造和提高的过程。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以后，我国各师范院校曾自编了很多《教育学》课本或讲义，其中有一些虽然在体系、结构上还基本上是老框子，在内容上也有借用凯洛夫《教育学》中符合客观规律的成份，但主要是密切结合我国教育实际的论述，因此不能说它们都是“凯洛夫《教育学》的翻版”，更不应该诬蔑它们是什么“封资修大杂烩。”当然，我们实事求是地肯定十七年，说十七年是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只有某些“左”的干扰，根本不存现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并不等于说应该全面肯定凯洛夫《教育学》。

评凯洛夫《教育学》關於 教育的社会规律的论述

总的说来，凯洛夫《教育学》虽然力图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来分析教育问题，但它关于教育的社会规律的论述是很不彻底的。

首先应该肯定，这本《教育学》对于教育的起源、教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教育的历史性、阶级性等重要问题，都作了比较正确的论述。它正确地指出，教育产生于劳动。而且明确指出：“教育是社会的历史的过程，它在阶级社会内是具有阶级性的。在和社会的历史发展一起改变着的教育领域内，如同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内一样，也表现着阶级的斗争。这就是说，教育总是和政治相联系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消灭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而以共产主义教育来代替它。”（见该书第10页）在论述“苏维埃国家中的教育的性质”时指出：苏维埃政权公开声明：“将要这样地来组织培养和教育青年的事业：使它成为反对剥削者斗争的有力武器，成为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武器。”同时说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便面临着一种任务：“要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统治庸武器，变成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武器，变成共产主义的改造社会的武器。”（以上均见该书第11页）这些论述是以马列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来研究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因而是正确的教育理论。这些马列主义教育理论在五十年代初期传入我国，对我国教育界产生过很好的影响。通过学习这些教育理论，有利于我们提高对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批判“教育超阶级”、“教育超政治”、“教育救国”、“教育清高”等资产阶级教育观点；也有助于我们揭穿和批判杜威“民主主义教育”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杜威一贯标榜和吹嘘的“民主主义教育”，实际上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玩弄阶级调和的工具，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专

政的工具。这对于我们清理和批判杜威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界的影响是有益的。

但是，必须指出，凯洛夫等人在论述教育的社会规律时，并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凯洛夫《教育学》对教育阶级性的论述，只停留在社会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一讲到社会主义之后，特别是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的教育，就认为没有什么阶级性了。

凯洛夫《教育学》强调“苏维埃社会的阶级结构改变了，剥削阶级不复存在了”（见该书293页）。我们认为，这句话本身并不错，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在苏联确实是“不复存在”了；但是，不能由此而得出：在“苏维埃国家里，没有阶级对立”（见该书227页）、没有阶级斗争的结论。可是，凯洛夫《教育学》却作出了这样不切实际的结论。这样，阶级斗争在教育领域内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连斯大林同志说的人们意识中遗留的资本主义余毒也不见了，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没有阶级性了。这不仅与苏联的实际情况不符，从理论上讲，它既违背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不符合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列宁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整个历史时代中，剥削者虽然已经被击溃，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还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且时时梦想把这种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还进一步指出，旧的一代剥削者被清除了，而在这种土壤上还会产生新的剥削者。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我国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篡权，都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在《关于

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首次明确宣布，在苏联国内“所有剥削阶级都消灭了”。这是符合苏联国内实际情况的。他的缺点是，没有同时指出还存在着剥削阶级残余，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时隔不久，斯大林就发现了这个缺点。在次年三月，他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就宣布了在苏联国内还有“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从上述历史事实可见，斯大林在宪法中确有否认阶级斗争的倾向。但时间很短，当时在实践上并未造成危害，他主要是在随后不久犯了阶级斗争（主要在肃反上）扩大的错误。历史证明，说斯大林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炮制者”是荒谬的；说凯洛夫《教育学》的上述论点来源于斯大林也是没有根据的。

从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看，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被资本主义社会包围着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那样的阶级社会，虽然它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已经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但是，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中是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就是在农业集体化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尽管作为阶级的富农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不存在了，但是，也还会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会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会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还会有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它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活动，所以阶级斗争仍然会存在的。并且，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又总是密切联系的，所以各种阶级敌人还将长期存在。斯大林过份强调这一点，把